

林慶彰 主編

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

花木蘭
文化出版社
出版

中國學術思想

研究輯刊

十八編

林慶彰主編

第14冊

山川地理與南學北學：
從章劉之爭看皖派考據學的經典化

張徐芳著

馬浮研究

劉又銘著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山川地理與南學北學：從章劉之爭看皖派考據學的經典化 張
徐芳 著／馬浮研究 劉又銘 著 — 初版 — 新北市：花木蘭文
化出版社，2014〔民 103〕

目 2+90 面+序 6+ 目 4+146 面：19×26 公分

（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八編：第 14 冊）

ISBN：978-986-322-685-7（精裝）

1. 章炳麟 2. 劉師培 3. 馬浮 4. 考據學 5. 儒學

030.8

103001982

ISBN-978-986-322-685-7



9 789863 226857

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

十八編 第十四冊

ISBN：978-986-322-685-7

山川地理與南學北學：
從章劉之爭看皖派考據學的經典化
馬浮研究

作 者 張徐芳／劉又銘

主 編 林慶彰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副總編輯 楊嘉樂

編 輯 許郁翎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社 長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hml 810518@gmail.com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

初 版 2014 年 3 月

定 價 十八編 16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28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山川地理與南學北學：
從章劉之爭看皖派考據學的經典化

張徐芳 著

作者簡介

張徐芳，女，1974年生，江蘇江陰人。2006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，獲文學博士學位。曾在南京曉莊學院人文學院任教。2008年至今，在廈門大學圖書館工作，現為特藏部館員。發表論文有《「義法」之法——兼論姚鼐論文的方法》等，譯有《人間詞話》（漢英對照之今譯）。

提 要

章太炎、劉師培共同信奉立足種姓的「國粹」。《左傳》是維繫中華文明往古迄漢「不絕如線」的紐帶，對《左傳》的興趣是章、劉交誼的學術基礎。章、劉交往伊始即展開廣泛的學術論爭。雙方分歧源自思想領域。劉師培背棄革命最終導致雙方絕交。

從結撰《嘯書》起，章太炎開始大力關注「文辭」，在文體上實現了由秦漢文向魏晉文的突破，並發現了六朝「精辨」文的價值。

章太炎的「文學」建立在小學基礎上。「故訓求是之文」被推為「文辭」的極致，「持理議禮」是其文章理想，皖南學派的樸質之文受其推崇。

根據「質言」的文辭觀，章太炎完成區分吳、皖，揚州學術因文辭遭貶抑。針對章氏敘述，劉師培積極調動揚州學術資源，運用「自然地理」與「人文地理」的兩種視角，構建起南北學術統系：江南徽州被納入北學系統，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南學派因而獨立於桐城文風彌漫的江淮地區；因「文辭」受章太炎批評的揚州學術被劉師培單獨拈出，續上皖南的學脈，在其整體稱揚北學的思路下揚州地位得以提升。

章、劉通過對「文辭」的避讓，共同推尊皖南。這一傾向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的清學史敘述中不斷重複，皖南學派的中心地位得以確立。



目次

緒論	1
第一章 章劉之爭始末	5
第一節 章劉訂交的思想基礎：立足「種姓」的「國粹」	5
第二節 論爭範圍：紮根思想領域——以「水地」區劃方言為例	24
第三節 論爭的不和諧音：來自學術以外的干擾	37
第二章 皖南學派中心地位的確立——章劉對文辭的避讓	51
第一節 《煇書》自擬《昌言》與章太炎的文體探索——六朝「精辨」文的新系列	51
第二節 《訂文》與「正名」——章太炎「持理議禮」的文章理想	61
第三節 「自然地理」與「人文地理」的視角轉換——揚州學派的提出及南北學術統系的劃分	70
結語	79

緒 論

章太炎與劉師培曾是推心置腹的學術知己，後因捲入種種是非，交往中斷。章氏一度有意修好，但因「形格勢禁」終歸無效。〔註1〕其積極、友好的態度在致劉師培的信中有充分體現，個中最打動人心的是太炎先生對昔日切磋學藝的美好時光的懷戀：「疇昔坐談，蓋嘗勤攻君過，時有神悟，則推心歸美。此蓋朋友善道之常，而君豈忘之耶？」〔註2〕可見當日推心置腹之誼與往復論難的「契洽」。章、劉二位爭論學術的往事不僅限於書齋內的口頭討論，也形諸文字。二位分別留存於世的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、《章氏叢書》即為明證。比參二書，「勤攻君過」與「推心歸美」的印迹斑斑可考。

章、劉論爭的重要方面是對揚州學術的評價。章太炎不太肯定揚州，其意見牽涉到對清學派別的總體把握。章氏綜論清學史面貌的《清儒》以吳、皖二派該括分理。吳派親近文辭，頗受訾議；皖派則因主張其所推崇的樸質文風受到稱讚。在此基礎上，其他各派均藉由近吳或近皖論定高下。文辭是章太炎衡量清學派別的重要尺度。按照這一思路，主張文辭的核心力量——桐城派及揚州駢文派理所當然地處於批評中心。揚州還是清代考據學的重鎮，在《清儒》的敘述框架下，其出色的考據成果幾乎因「文辭」的牽連而被一筆勾銷。這對立志光大揚州學術的劉師培來說顯然是不能接受的。他將怎樣處理？

〔註1〕參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（《劉師培全集》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）卷首附《章太炎黃季剛二君關於劉申叔君之文十首》錢玄同題下按語。

〔註2〕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四）頁157《再與劉光漢書》。按，此信收入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卷首附《章太炎黃季剛二君關於劉申叔君之文十首》時，題作「與劉光漢書七」，繫於「前三年（1909）己酉」。

「文辭」是章太炎從事《煊書》結撰以來傾力關注的中心。通過刪革《煊書》，章太炎開始了由秦漢文向魏晉文邁進的文體探索，並形成了全新的文辭觀。期間經歷了怎樣的過程？

章太炎的「文學」建立在小學的基礎上，小學與名學的目標存在某種一致，這與其紮根於名學的文章理想有何關聯？

章太炎是名重一時的革命領袖，是革命新人劉師培的尊崇對象。當革命處於低潮，雙方表現如何影響了曾經建立的革命友誼，章太炎是如何挽救的，劉師培對於章太炎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？

以上問題均值得追問。

對於像章太炎、劉師培這樣才銳學豐、思深意遠的人物，通觀總體然後作高屋建瓴的把握，無疑是實現研究目的的最切實有效的途徑。然而目前對我來說卻幾乎是妄想。為擺脫研究的窘境，本書則嘗試另一種可能的辦法。

在一篇關於傅斯年的論學文章中，陳平原先生述及民初北大文科的基本風貌，引錄了錢玄同對顧頡剛的一段教誨：

我們今天，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，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，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，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相。《聊齋誌異》上記着一段故事，說有一個桑生，先後接納了兩個奔女，不久蓮香指李女為鬼，李女指蓮香為狐；桑生初疑她們是嫉妬性的攻擊，但經歷了長時期的考驗，就證明了蓮香果真是狐，李女果真是鬼。我們今天，正該從今、古文兩派的相互指摘之下接受他們雙方的結論。〔註3〕

錢玄同談狐說鬼的目的，意在增加話語的形象性。但以撕破假面目比擬今古文的臆理，顯然言之過火，帶有凌越今古文的偏見和意氣。不過，汰去當局者的此層臆見，錢玄同的說法仍具有相當的合理性。陳平原先生評價道：

單從互相撕破假面目這一角度看，錢說是站得住腳的。而且，如此讀書，不失為一種取巧的辦法。因為，沒有比論敵更熱心於鑽研對方著作並發掘謬誤的了。民初北大文科學生，很可能正是從解讀經今、古文論戰中，獲得獨立思考的空間，並培養某種程度的懷疑精神。〔註4〕

〔註3〕 顧頡剛《秦漢的方士與儒生》（顧頡剛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）序。

〔註4〕 陳平原《失落在異邦的「國故」》，《讀書》2002年第6期。

可以相信，傅斯年日後在語言歷史上的獨立思考就應該得益於這一閱讀氛圍。

錢玄同教導的這種「借今、古文的縫隙，凸顯自家的學術思考」〔註5〕的方法，為我的觀察角度提供了有力參照，「取巧」則不敢。

章、劉彼此都深知對方學問的得心應手處，各自學力也足以洞察對方的罅漏和縫隙。憑藉二位犀利的目光試著去增加自身鏡片的清晰度，使我不期然獲得了些許自信。

視角的更新當然不足以保證研究的可信度。為此，文中的論證每推進一步必然都伴隨著一個笨拙的計較。爬梳分理，從傳統的譜錄，到近現代興起的表格的運用，意在通過一系列事象的對比、排列，盡可能做到對事情本來面目的忠實。然而，晚近紛雜的社會現實，當事人陳述時的閃爍其辭，以及事後追憶的不盡可靠，等等，種種因素的摻雜，都給事實的清理增加了難度。對此，文中將盡量小心翼翼地抽絲剝繭；同時，考慮到易代之際士人心境的特殊性，也將盡可能予以同情的理解。

本書採用文本細讀的方式，嘗試挖掘某些常見文獻的深層涵義，以加強現有資源的充分利用。閱讀過程中，一再提醒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，恐怕仍躲不過隨處而在的文字陷阱；文中將盡量提高解釋的有效性，以免濫用之嫌。為使行文不致過於拘謹，敘述時適當採取變通，注意調整語氣和方式。

文中每一個結論雖然都幾經斟酌，但始終不敢存有絲毫盲目的自信。最終的結果很可能將成為這樣：潛心摸索的過程才是我真正最大的收穫。

〔註5〕 陳平原《失落在異邦的「國故」》，《讀書》2002年第6期。

第一章 章劉之爭始末

章太炎與劉師培訂交伊始便很快在人生方向上達成一致，促使他們彼此吸引的力量是在種族革命基礎上談論國粹的共同信念。雙方訂交也意味著一場學術論爭的開始。這場論爭涉及廣泛，更深入到思想領域。以水地區劃方言為例，有關「夏音」與「楚音」的爭論可以追溯到章太炎主張建都武昌的種族革命目標。章、劉二位論學相長的探討氛圍促進了彼此學術的成長，但是，學術以外的干擾因素始終存在。劉師培對革命事業的背棄最終使雙方終止交往。此後，章太炎對他心存芥蒂，直到終身。

第一節 章劉訂交的思想基礎：立足「種姓」的「國粹」

1903年，劉師培因追隨革命抵達上海，與志趣相投的章太炎結識，隨後雙方訂交。^{〔註1〕}也就是這一年，彼此往復書信多次，開始文字交往。目前所知最早的信件，為章太炎來信。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卷首附《章太炎黃季剛二君關於劉申叔君之文十首》收錄時題作「與劉光漢書一」，繫於「民元前九年（1903）癸卯」。^{〔註2〕}信中首次提起劉家左氏絕學，隱約流露相期說經的願望：

上海市井叢雜，文學猥鄙，數歲居此，不見經生。每念疇昔，

〔註1〕參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（《劉師培全集》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）卷首附蔡元培《劉君申叔事略》；梅鶴孫著、梅英超整理《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）頁35。

〔註2〕姚奠中、董國炎《章太炎學術年譜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）頁82載，「今存太炎本年（1903）致劉師培書二通」。

心輒惘惘。仁君家世舊傳賈（逵）、服（虔）之學，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？孟瞻（劉文淇）先生所纂《正義》，秘不行世，鄙人素治茲書，蓋嘗上溯周漢，得其傳人，有所陳義，則以孫卿、賈傳（誼）爲本，次即子駿（劉歆）父子。中壘（劉向）雖治《穀梁》，然呻吟《左氏》，見於君山（桓譚）《新論》。是故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所述單文隻字，悉東序之秘寶、石室之貞符也。數歲以來，籀繹略盡，惜其不成，仍當勉自第次。學術萬端，不如說經之樂，心所繫著，已成染相，不得不爲君子道之。他日保存國粹，較諸東方神道，必當差勝也。〔註3〕

「賈、服」指東漢賈逵與服虔，治《左傳》。賈有《春秋左氏解詁》，服有《春秋左氏傳解》。〔註4〕「孟瞻」是劉師培曾祖劉文淇的字，一生肆力《左傳》，曾取賈、服古注疏通證明，成《左傳舊注疏證》八十卷及《左傳舊疏考正》六卷。〔註5〕信中提到的《正義》當指前者。劉文淇後，子孫傳經，三世弗替。〔註6〕至劉師培一代，猶能謹守絕業。爲成就一部曠世傑作，劉氏子孫世代相繼，終清之世也只完成《左氏舊傳疏證》的上半部，因而一直以資料或未完稿視之，對外宣稱時僅提「長編」、「稿本」，〔註7〕並慎持密守，不向外間流佈。〔註8〕劉師培的家世和個人天生的異稟，〔註9〕使章太炎相信，通過這位

〔註3〕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（《劉師培全集》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）卷首附。

〔註4〕參《後漢書》（范曄撰，中華書局1965年版）卷三十六《鄭范陳賈張列傳》（頁1235）、卷七十九下《儒林列傳》（頁2583）。

〔註5〕參《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》（梅鶴孫著、梅英超整理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）卷末附劉寶楠《清故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劉君墓表》、丁晏《皇清優貢生候選訓導劉君墓誌銘》。按，張舜徽《清代揚州學記》（廣陵書社2004年版）頁185稱：「劉文淇整理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是分兩方面著手的。一是研究舊注；一是研究舊疏。分寫爲《左傳舊注疏證》和《左傳舊疏考正》兩部專著。」同書頁186還提到：「《左傳舊疏考正》一書，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即已刊行。獨《左傳舊注疏證》一書，卷帙浩繁，不易卒業。」

〔註6〕參《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》（梅鶴孫著、梅英超整理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）卷末附徐乃昌《清故舉人揀選知縣儀徵劉先生墓誌銘》。

〔註7〕按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（《劉師培全集》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）卷首附劉富曾《亡姪師培墓誌銘》提及時，稱「《左氏長編》」、「《左疏》稿本」。

〔註8〕參梅鶴孫著、梅英超整理《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》頁15、16。按，此書建國初始由政府組織整理出版。

〔註9〕按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（《劉師培全集》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）

年輕人正可一窺劉家左氏絕詣。

還在詁經精舍時，章太炎就已經開始學習《左傳》。當時，公羊學如日中天，正值泛濫。戊戌變法時期，康有為的「大同」理想學說更助長了這一趨勢，直到章太炎寫作此信的1903年，其影響未輟。〔註10〕這段時間，章氏對《左傳》的學習基本處於獨學無友、自我摸索的狀態，〔註11〕自然很希望得到高人指點，也亟待尋求知音的共賞。因而，劉師培的出現著實讓他驚喜。

信中，章太炎掩飾不住獲交知己的興奮：一上來就提起劉氏世守「賈、服之學」的背景及「孟瞻先生所纂《正義》」的行世情況。作為同道，章氏主動公佈自己獨到的發現，以劉向治《左傳》為談論起點，給出一個與以往左氏學不同的經師授受序列，劉師培隨後的覆信就對此發出追問和辯難。限於此通書信目前無從尋檢，難得其詳，但從章太炎的答覆可略知劉氏所言大概：

至以中壘（劉向）亦治《左氏》，說似支離，然君山（桓譚）《新論》，明言「劉子政（向）、子駿（劉歆）、伯玉（劉棻）父子，呻吟《左氏》，下至婢僕，皆能諷誦。」此語固非無據。〔註12〕

卷首附劉富曾《亡姪師培墓誌銘》稱：「姪生而岐嶷，髫髻授讀，過目成誦，習為詩文，有如宿構。亡友朱君鳳儀目為奇童。迨兄歿，姪入泮後，即膺鄉薦，是為光緒壬寅，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，時姪年僅十有九也。英妙獲雋，聲譽鵲起。」

〔註10〕參諸祖耿《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》，姚奠中、董國炎《章太炎學術年譜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）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條下附。

〔註11〕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四）頁146《與劉光漢書癸卯》：「今者奉教君子，吾道因以不孤。積年鬱結，始一發抒，勝得清酒三升也。」按，此信亦見於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（《劉師培全集》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）卷首附《章太炎黃季剛二君關於劉申叔君之文十首》，題作「與劉光漢書二」，繫於「前九年（1903）癸卯」。

〔註12〕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四）頁146《與劉光漢書癸卯》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（《劉師培全集》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）卷首附《章太炎黃季剛二君關於劉申叔君之文十首》收錄時題作「與劉光漢書二」。按，黃暉《論衡校釋》（中華書局1990年版）卷十三《別通篇》劉盼遂按語：馬總《意林》三卷引桓譚《新論》：「劉子政、子駿、伯玉並呻吟《左氏》。」同書卷二十九《案書篇》「劉子政玩弄《左氏》，童僕妻子皆呻吟之。」句下劉盼遂按語：此二語本於桓譚《新論》。馬總《意林》引《新論》云：劉子政、子駿，子駿兄弟子伯玉，俱是通人，尤重《左氏》，教授子孫，下至婦女，無不讀誦，此亦蔽也。」仲任正本斯文。可見，章太炎引文混合二語而成。章氏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（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二）頁855）辨劉向治《左傳》一節完整表述此段如下：「《論衡》言：『子政玩弄《左氏》，童僕皆呻吟之。』《御覽》卷六百十及六百十六並引桓譚《新論》曰：『劉子政、子

由此可以推斷，劉師培的疑問就圍繞劉氏父子治左氏的話題展開，結論與章太炎相左。

此後幾封信的話題都沒有脫離《左傳》，說明雙方討論興趣濃厚。章太炎《與劉光漢書一》以佛學語言描述個人對《左傳》的癡迷，說的正是實情。但章太炎汲汲辯護劉向與《左傳》的關係，應該還有他特別的考慮。

《左傳》是一部先秦典籍，相傳由左丘明編定。西漢末年，隨著古文經學的崛起，《左傳》傳不傳《春秋》的問題日益凸顯。今文經學傾向於「不傳」，與古文經學觀點適相反對。〔註 13〕至清代劉逢祿，在此基礎上更系統全面地提出劉歆篡僞的說法。〔註 14〕這引起章太炎的極度不滿。

章氏自述批駁經過曰：

既治《春秋左氏傳》，爲《敘錄》駁常州劉氏（逢祿）。書成，呈曲園（俞樾）先生。先生搖首曰：雖新奇，未免穿鑿，後必悔之。由是鋒芒乃斂。〔註 15〕

俞樾的意見自然有其道理，〔註 16〕章太炎後來的反省則是，「《春秋左傳讀》，乃僕少作，其時滯於漢學之見，堅守劉、賈、許、穎舊義，以與杜氏立異，晚乃知其非」。〔註 17〕說明師徒立說角度並不一致。聯繫章太炎對詁經精舍時期跟隨俞樾治經的總體評價，〔註 18〕可知，家法不同才是彼此分歧的關鍵。

章太炎在完成詁經精舍課藝的同時，並沒停止學習《左傳》。這一時期完

駁、伯玉三人，尤珍重《左氏》，下至婦女，無不讀誦者。』」可參。

〔註 13〕 參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（中華書局 2004 年版）頁 51；沈玉成、劉寧《春秋左傳學史稿》（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）頁 80：「關於《左傳》是否解經之作，即《左傳》是經還是史，這是從劉歆到當代爭論了兩千年的題目，和《左傳》的真僞、作者、編定以至所謂《春秋內外傳》等等，都是《左傳》研究中歷來糾纏不清的問題」。

〔註 14〕 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）卷一「惠公元妃孟子」條下：「余年十二，讀《左氏春秋》，疑其書法是非多失大義；繼讀《公羊》及董子書，乃恍然於《春秋》非記事之書，不必待左氏而明。左氏爲戰國時人，故其書終三家分晉；而續經乃劉歆妄作也。」

〔註 15〕 參諸祖耿《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》，姚奠中、董國炎《章太炎學術年譜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）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條下附。

〔註 16〕 按，俞樾治經頗右《公羊》。參章太炎《自述學術次第》，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章太炎卷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）。

〔註 17〕 章太炎《與徐哲東論春秋書》，《制言》，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）第十七期。

〔註 18〕 章太炎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譜》（上海書店 1986 年版）「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）」條：「及從俞先生游，轉益精審，然終未窺大體。」

成五十多萬字的《春秋左傳雜記》〔註 19〕即是明證。以此為基礎，章氏又作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專門駁難劉逢祿新說。其序曰：

及劉逢祿，本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之說，謂條例皆子駿（劉歆）所竄入，授受皆子駿所構造，著《左氏春秋考證》及《箴膏肓評》，自申其說。彼其摘發同異，盜憎主人。諸所駁難，散在《讀》（《春秋左傳讀》）中。〔註 20〕

劉逢祿以「《左傳》不傳《春秋》」為立說之本，因此，章太炎要支持古文經說，就必須先予破除。此外，為建立孔子與左丘明的直接關係，章太炎還努力改變今文學家塑造的孔子形象。

為利於政教，今文經學從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開始，經何休的《公羊傳》，製造了孔子託古改制的預言，視其為政治家。清代，劉逢祿更準確、細緻地重建何休的公羊學家法，〔註 21〕堅固其說。至康有為等人，基於維新大業，更有系統發揮。〔註 22〕章太炎深知其中危害，從事《左傳》伊始，就立志撥開公羊的迷霧。據諸祖耿《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》載其自述曰：

余（章太炎）幼專治《左氏春秋》，謂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語為有見；謂《春秋》即後世史家之本紀列傳；謂《禮經》《樂書》，彷彿史家之志；謂《尚書》《春秋》，本為同類；謂《詩》多紀事，合稱《詩》《史》；謂《易》乃哲學，史之精華，今所稱社會學也。方余之有一知半解也，《公羊》之說，如日中天，學者煽其餘焰，簧鼓一世。余故專明《左氏》以斥之。然清世《公羊》之學，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，

〔註 19〕按，後更名《春秋左傳讀》，「取發疑正讀為義」，並有《左傳讀續編》。參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～1986 年版）（二）頁 808《春秋左傳讀敘錄·序》。

〔註 20〕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～1986 年版）（二）頁 808、809。

〔註 21〕（美）艾爾曼《經學、政治和宗族——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》（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）頁 176。

〔註 22〕按，章太炎《國學概論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）頁 29：「劉氏（逢祿）亦講《公羊》，卻有意弄奇，康有為的離奇主張，是從他的主張演繹出來的」。艾爾曼《經學、政治和宗族——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》頁 173：「《左氏春秋考證》被收入《皇清經解》。後來，康有為閱讀《皇清經解》時，該書曾直接影響康有為的經學觀。此外，劉逢祿的研究為魏源、廖平、康有為等學者的研究開闢了道路。」另可參鄭師渠《晚清國粹派：文化思想研究》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）頁 260、261。

康有為倡改制，雖不經，猶無大害。其最謬者，在依據緯書，視《春秋經》如預言，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。民國以來，其學雖衰，而疑古之說代之，謂堯舜禹湯皆儒家偽託。如此惑失本原，必將維繫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。國亡而後，人人忘其本來，永無復興之望。余首揭《左氏》，以斥《公羊》。今之妄說，弊更甚於《公羊》。此余所以大聲疾呼，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。〔註23〕

依託於章學誠的「六經皆史」說，章太炎對六經作了重新理解。〔註24〕他將整個上古歷史看作一部大史書，有關經典只算得其中的一個類目。這樣，公羊家眼裏先知先覺的孔子在他看來只是眾多史家中的一位，其所有知識充其量不過為「史」的某個方面。這種大膽的「史化」傾向頗為出格，已遠遠超出對古史本身的關懷。

確定《春秋》為史的性質，有助於樹立孔子的新形象。此前，章太炎一直為此努力，駁劉逢祿的文章受到俞樾批評後，章氏雖然「鋒芒乃斂」，但駁斥公羊的念頭並未就此打消。1897年，他決定批駁康有為，直接針對《新學偽經考》。這一次，卻被孫詒讓勸止，理由是要顧全維新大業。〔註25〕雖然其意見遲至1903年發表《駁康有為論革命書》時才公諸於世，但明顯被吸收進1902年下半年左右完成的重訂本《煇書》。〔註26〕

《煇書》是章太炎1900年1月左右著手結撰的自選集，當時雖也提到「攘逐滿洲」，但態度不是很堅決；直到當年夏秋間，章太炎因上書李鴻章失敗，才正式表明反清的決心，並迅速反映在隨後修訂的《煇書》中。〔註27〕

相對於初刻（包括排滿意識增強的「補佚」本），重訂本在篇目上有較

〔註23〕 姚奠中、董國炎《章太炎學術年譜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）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條下附。

〔註24〕 按，王中江《歷史與社會實踐意識：章學誠的經學思想》（《經學今詮續編》，《中國哲學》第23輯，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）指出：章學誠通過對「六經皆史」的「始源性」追溯，指出考據家前提的錯誤，並開始關注「普遍的『經』之『經世』精神」，強調「『道』和『理』都離不開時代的『器』和『事』這種普遍的實踐意識」，可參。

〔註25〕 參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四）頁225《瑞安孫先生傷辭》、《汪康年師友書札》（上海圖書館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～1989年連續出版）頁1474～1476《孫詒讓（四）》。

〔註26〕 按，重訂本《煇書》直到1904年6月才出版，參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三）朱維錚《前言》。

〔註27〕 參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三）朱維錚《前言》。

大改動，新增了《方言》、《定版籍》、《原教》等，結構上也作了大幅度調整。〔註28〕全書引人注目的新變化是增加了「西方社會學」說在其中的份量。開篇具總綱性質的《原學》提出「今之爲術者，多觀省社會、因其政俗，而明一指」〔註29〕，強調社會、政治狀況對學術盛衰起決定性作用。這一結論明顯是在深入研究西方社會學基礎上的新成果，不同於先前熱衷進化論時的認識。〔註30〕

《煊書》重訂本標誌了章太炎思想的新飛躍，是其一生中的一件大事。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是，《訂孔》對原有儒學體系造成的強勁衝擊。在編排順序上，該篇僅次於《原學》，佔據全書的顯要位置。篇中指出：

雖然，孔氏，古良史也。輔以丘明而次《春秋》，料比百家，若旋機玉斗矣。（司馬）談、（司馬）遷嗣之，後有《七略》。孔子歿，名實足以抗者，漢之劉歆。〔註31〕

康有爲等保皇黨人，雖也曾構築過孔學的新體系，將其塑造成政治改革家形象，但在保皇的宗旨下，最終仍淪爲變相的尊孔。〔註32〕《訂孔》爲孔子定位時，不取「儒術所以能爲奸雄利器」〔註33〕之說，實際在弱化孔子與政治的關係，同時，稱孔子爲「古良史」，又否定了孔子的聖人地位。〔註34〕這一違背常識的看法在當時的知識界立即引起轟動，一時被斥爲「離經叛道」。〔註35〕

章太炎在這裡建立的「良史」系列，由繼起的司馬談、司馬遷及劉向、劉歆組成，劉歆並被視爲具有與孔子同等重要的地位。這一系列有兩個關節點：一是左丘明，一是劉向。認定「《左傳》傳《春秋》」，實際就是搭上孔

〔註28〕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三）朱維鈺《前言》。

〔註29〕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三），頁134。

〔註30〕參姜義華《章太炎思想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）頁165～168。

〔註31〕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三）頁135。

〔註32〕參姜義華《章太炎思想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）頁169、蕭公權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：康有爲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》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）頁84。

〔註33〕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三）頁134。

〔註34〕按，章太炎《與人論樸學報書》（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～1986年版）（四）頁154。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十月二十三日出版的《國粹學報》第二十三期，題作《論樸學報書》）以孔子開創修史體例作爲孔子稱「聖」的解釋，可參看。

〔註35〕夏志學《章炳麟氏〈煊書〉書後》，轉引自姜義華《章太炎思想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）頁170。